

回顾与反思：国内英尼斯传播思想研究述评

汪旭

摘要：我国对于英尼斯^①传播思想的研究关注最初是经由麦克卢汉开始的。而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媒介影响无远弗届的今天，以媒介技术为切入视角、以社会关怀为理论底色的英尼斯传播思想的地位随着时间发展逐步上升。国内对于英尼斯的研究也走过了引入介绍到上升发展的过程，取得了不少阶段性的成果。但对于英尼斯传播思想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问题仍然尚待回顾与反思。

关键词：英尼斯；传播思想；述评；反思

作者简介：汪旭，男，文学硕士。（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411105）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9) 02-0078-05

自1998年9月媒介环境学派的制度化组织——媒介环境学学会由波兹曼一手创立算起，这一年轻的、从不缺乏争议的研究范式历经了从“边缘”到“庙堂”的过程。在几代学人共同的建设下，媒介环境学派已然成为传播学领域与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并列的三大学派之一。媒介环境学会的20周年年会也回到学派思想重要的诞生地——多伦多大学举办，会议主题为：“媒介伦理：互联世界中的人类生态（Media Ethics: Human Ecology in a Connected World）”^[1]。之所以说多伦多大学是媒介环境学思想最重要的诞生地，是因为早在学会组织正式成立之前，多伦多大学就汇聚了当时的“多伦多双星”——英尼斯与麦克卢汉，其中英尼斯更是后世媒介环境学派的思想奠基人。

正如美国传播学者罗杰斯（E. M. Rogers）在《传播学史》中所说，任何涉入一条新的河流的人都知道这里的水来自何方，它为什么这样流淌。本文试图对作为日益壮大的媒介环境学派的源头的英尼斯的传播思想进行重新观照、整理，并将国内对于英尼斯传播思想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发现研究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己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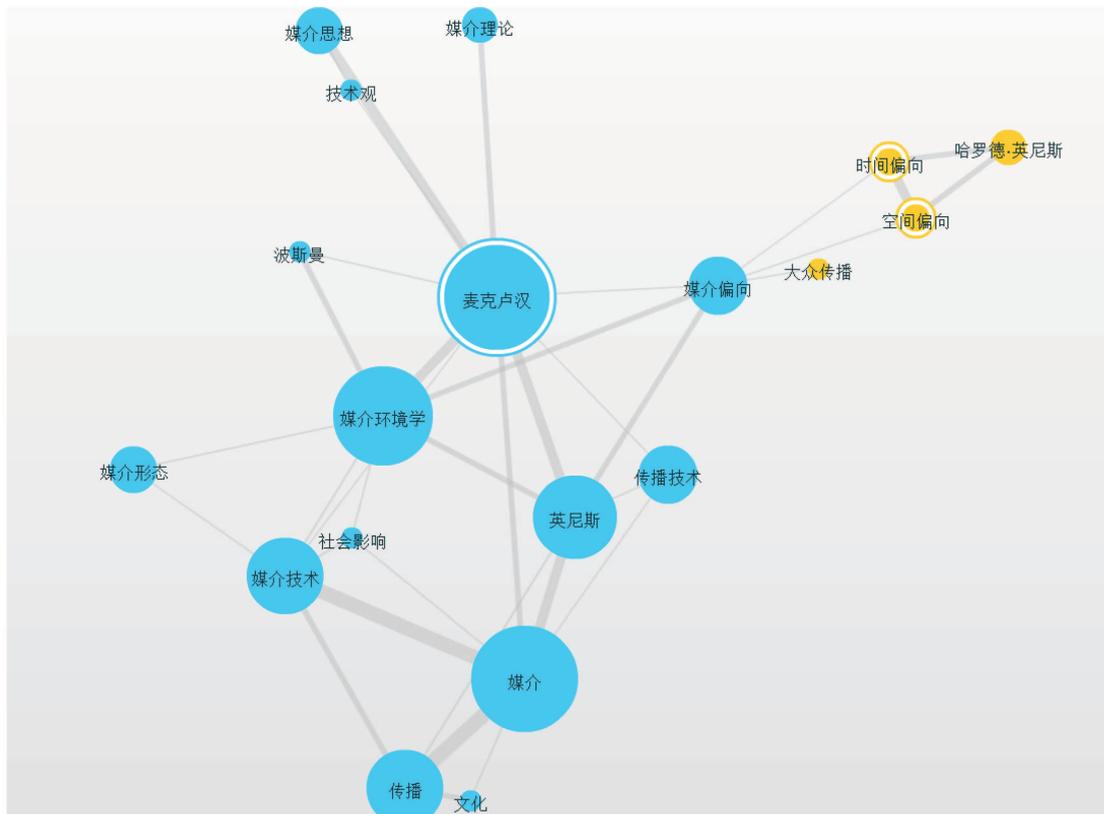
一、20世纪90年代：英尼斯传播思想的传入、介绍阶段

1989年，我国学者徐达山译介了多伦多大学麦克卢汉文化及技术研究所朱迪斯·拉扎尔的文章《传播科学往何处去？》一文，文中提到：“传播研究的历史向来是与技术发明相呼应的……英尼斯这位传播理论大师曾经说过，传播技术方面发生的变革必然会引起思维方式和组织方面的变革。”^[2]这是英尼斯最核心的思想与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初次会面。以此为始，国内一批具有高度学术敏感与前瞻的学者开始在著作与论文中介绍英尼斯的传播思想。上海大学戴元光、张咏华教授与浙江大学邵培仁教授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分别在《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大众传播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和《传播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等著作中对英尼斯的“传播偏向论”做了简要介绍。而与此同时，时任暨南大学教授陈卫星在《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4）一文中以麦克卢汉的“启蒙者”和“理论先行者”的角度对英尼斯进行了介绍，文中开辟了专门的篇幅阐述英尼斯“传播的倾向”与媒介和权力“相互决定”的关系两个概念对麦克

^① 关于 Harold Innis 的中文译名译法不一。何道宽译为“伊尼斯”，国内另有“英尼斯”“因尼斯”等译法，我国台湾地区又译为“殷尼斯”。本文采用目前使用最广的“英尼斯”译名。

卢汉的启发。其中提及了《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与《传播的倾向性》（*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两部著作，但或许由于时代与文章主题偏向的原因，作者仅将“帝国”理解成“英国和美国对加拿大的支配”，而非我们后来认为的更具概括性的宗教性组织与世俗权力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怡红教授在《“忧虑的时代”与不忧虑的麦克卢汉》（国际新闻界，1997.1）中同样从英尼斯对麦克卢汉的影响入手，简要介绍了英尼斯的研究方法。需要提出的是，作者在文中将英尼斯与麦克卢汉表述为师生关系至今仍未得到有力的证明。香港浸会大学李月莲教授发表《外来媒体再现激发文化认同危机》（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与北京广播学院王伟《哈罗德·英尼斯传播理论与美加文化战》（现代传播，1999.2）以英尼斯的“中心—边缘”与“传播的偏倚”理论为依据，从电视与广播发展的实际情况分析了美国对加拿大的文化渗透现象和加拿大所做出的反渗透的努力，较早地关注了英尼斯传播理论中美国文化渗透这一现象。

回顾这一时期的英尼斯研究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英尼斯的传播思想被正式引入中国传播学界，无论是教材著作还是期刊论文中所提及的英尼斯，都与麦克卢汉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麦克卢汉研究展开后的衍生物。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新闻传播学科条目下关于英尼斯研究的计量化可视分析的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显示（见下图），在国内的英尼斯相关研究文献中，“麦克卢汉”始终是最主要的关键词之一。



但事实上，早在英尼斯转入传播研究领域之前，他已经凭借着关于铁路、木材、鲑鱼等“大宗商品”研究成了加拿大颇有名气的政治经济学家，当他沿着木材——纸浆——报纸这一路径在生命的最后10年投入传播研究时，并没有引起世人足够的重视。而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多数人对于英尼斯和他的传播思想的了解，往往要经由他在多伦多大学的“明星”同事麦克卢汉这一渠道。英尼斯的两本传播学著作《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均由麦克卢汉作序并大力推崇，序中麦克卢汉谦虚地说：

“我乐意把自己的《谷登堡星汉璀璨》看成是英尼斯观点的注脚。”^[3]

二、21世纪第一个10年：英尼斯研究的上升阶段

时间进入21世纪，以互联网为技术支撑的各项新媒体技术在我国蓬勃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媒介技术在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国内对于英尼斯的研究也从最初的传入、介绍，进入了上升、探讨的阶段，形成了一次研究小高潮。其中十分重要的现实前提是英尼斯的传播研究著作《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被正式引进国内。

2003年，由深圳大学何道宽教授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尼斯的重要代表作《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在国内面世，这标志着英尼斯的主要传播思想较为系统、完整地引入中国，为国内学者对英尼斯的研究与探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由于时空距离、语言障碍等原因带来的“时差”，国内英尼斯研究还属萌芽初期，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诚然是英尼斯研究逐步铺开、热度提高的上升期：北京工商大学徐佳权在2004年第3期《国际新闻界》发表的《传播图景中的制度——由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谈起》中以英尼斯的媒介理论为基础，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将传播现象划分为“媒介形态、媒介—社会机构和媒介—社会文化”^[4]三个维度进行分析，进而为传播媒介和社会生活的关系提出了一个“去魅”的解释。兰州大学唐克军的硕士论文《哈罗德·英尼斯的传播思想研究》是对英尼斯传播思想较为完整的一次梳理。复旦大学李洁在博士论文《传播技术与共同体：文化的视角》中，作者剖析了英尼斯与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与研究路径，试图回答“传播技术能否促成人类社会实现共同理想”这一元命题，其中将研究对象与加拿大这一民族国家的独特历史文化背景进行深层联系，提出了“技术民族主义”的国家悖论，具有很强的现实价值。张广生则在《媒介与文明：伊尼斯传播理论的政治视野》中试图从政治学视野入手，认为“帝国是传播及其媒介在一个文明中最终政治效果的表征”^[5]，但全文仍以对英尼斯传播理论的描绘为主，同时将英尼斯对于口头、印刷传统的偏好与德里达的“音位中心主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相联系，提供了具有价值的思考。深圳大学李明伟在《作为一个研究范式的媒介环境学派》中以库恩的“范式”概念论证了媒介环境学派的合法性，认为英尼斯“开启了对媒介本身及其重要社会历史意义的研究新领域”^[6]，并且对麦克卢汉产生了巨大影响。李明伟随后在《凡勃伦对伊尼斯传播理论的影响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一文中专门梳理了英尼斯具有的经济学背景以及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在整体、动态性的研究方法论和“垄断”“偏向”等关键概念上对英尼斯的启发。

三、2011年至今：英尼斯研究的成熟期

2010年以来，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国内对于英尼斯的研究进入了成熟期，越来越多的学者跳脱出理论阐释、全面出击的研究框架，开始对英尼斯思想从不同侧面进行深入剖析，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这一阶段英尼斯的著作《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双语版）以及他最后一部作品《变化中的时间观念》（*Changing Concepts of Time*）均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变化中的时间观念》的出版标志着英尼斯的“传播学三部曲”悉数引进国内，而双语修订版的出版则使得国内读者对于英尼斯的传播思想有了零距离接触的机会。与前两部著作不同的是，《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不再继续阐释有关时间、空间和媒介的理论，用英尼斯的原话来说：“（《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书中收录的文章试图将《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的主题用于解答现实的问题。”^[7]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美国帝国主义倾向的深刻揭示与批判，这也为新时期的英尼斯研究提供了更加深入的方向。

这一时期研究最大的创新或特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人们开始反思对英尼斯研究的完整性，并思考他在媒介研究学术谱系中的定位。厦门大学刘东莱博士在英尼斯帝国论与偏向论之外强调英尼

斯在大宗商品原材料生产、运输、流通，即物质生产而非物质特征的重要性（湖北大学学报，2011.3）。华东师范大学魏少华博士深入考查了英尼斯的学缘背景，讨论了英尼斯媒介论与传播学三大流派的相互关系（社会科学家，2013.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刘文辉《出版自由与传播垄断——论哈罗德·英尼斯对媒介帝国主义的批判》（现代出版，2013.6）一文没有过多地将关注点放在英尼斯的“偏向论”上，而认为英尼斯是“最早发现传播体制中的帝国主义的学者”^[8]，将文章的重点放在英尼斯对美国所强调的出版自由所带来的传播垄断的批判上。二是运用英尼斯传播思想作为理论基础，进而对其他研究对象或领域进行探索的研究开始出现，这也意味着国内对于英尼斯的相关研究进入了从介绍到阐释、从探讨到应用的成熟期。华中师范大学鲍立泉在《新媒介群的时空偏向特征研究》（编辑之友，2013.9）中运用英尼斯的媒介偏向论与莱文森的技术补救论为理论依据，审视今天以数字传播技术为基础的媒介集合（文中称之为“新媒介群”）的发展趋势与演进逻辑。中国人民大学李沁在《泛时代的“传播的偏向”及其文明特征》（国际新闻界，2015.5）中，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重新阐释了英尼斯的“偏向论”，提出在互联网文明下沉浸传播的模式中，传播的偏向是“人”这一全新命题。南京大学唐利在《百度百科的知识传播偏向研究》（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4）中，从波兹曼划分的“符号环境、感知环境和社会环境”^[9]三个层次上，考察百度百科在知识传播中的媒介特性和技术偏向，这也是运用传播偏向等理论进行新时代具体对象研究的成功案例。

四、结语：对于英尼斯研究现状的反思

通过对国内英尼斯主要研究的阶段性划分进行回顾可以发现，虽然英尼斯的思想地位及研究方式较最初引入时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我们认为，目前国内对于英尼斯的研究还远远称不上到达“黄金期”“爆发期”，人们虽已从不同角度谈及英尼斯的思想理论、发表观点，但却没有更多的反思或者碰撞，形成高度集聚活跃之势。作为英尼斯思想的重要推广人，何道宽在2013年修订版《传播的偏向》序言中就曾呼吁国内学界应当重新重视英尼斯的传播思想以“挽回因我们曾经的怠慢而造成的损失”^{[3](9)}。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国内研究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一）对英尼斯学术背景的忽视。英尼斯有着不可分割的政治经济学家与传播学家双重身份，十分善于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英尼斯本人也极力反对“专家化”“专门化”这一趋势。英尼斯的传播学研究是他前期经济学探索的自然延伸，他在论及加拿大政治经济形成时期的研究成果为后期的传播研究做了铺垫，而后期的传播学著作又是前期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和阐述，而贯穿始终的是他对制度权力关系、技术文化演进以及对于集中化控制与西方文明危机的关注。在目前的研究中，多数学者都已经认识到英尼斯经济学背景的重要性，所做研究中均有所提及，但在实际情况中，能够对英尼斯政治经济学背景进行深挖，细致探索他从经济学至传播学转向并阐释其中联系的研究依然缺乏。这其中存在文献资料的原因，相关英尼斯的权威传记，如海耶尔（Paul Heyer）所著的 *Harold Innis*，华生（Alexander Watson）的 *Marginal Man: The Dark Vision of Harold Innis* 及其他重要相关著作尚未引入国内，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我们对于英尼斯学术生平与研究方法的全面深挖与理解。

（二）对英尼斯学术归属的纠结。学派的划分为我们系统了解有着共通理论背景、相似研究方法和共同现实关怀的学者群体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 and 梳理某一学科领域的格局版图。但由于学派的划分，也使得少数研究者易对特定对象形成“标签化”的印象。以英尼斯为例，麦克卢汉认为：“他应该是以帕克为首的芝加哥学派的最杰出的代表。”^{[3](33)}而詹姆斯·凯瑞则否定了英尼斯与帕克的师承关系，并认为英尼斯不应当划归为任何一个学派。而媒介环境学会的创始人波兹曼则将英尼斯奉为学派的思想奠基人，称其为“现代传播学之父”^[10]，这也是我们对于英尼斯学派归属最普遍的看法。对于英尼斯这种学科背景复杂、研究领域广泛的学者而言，既不宜草率地将其划入“技术决

定论”的范畴,更不能忽视他在其他方面,如批判思想、社会关怀等方面的突出贡献,任何简单的标签化解读和过多学派归属上的纠结与争辩都将对英尼斯思想的深刻性与全面性造成巨大的伤害。

(三)对英尼斯思想理论与方法论贡献的探索仍待提高。众所周知,对传播学科有着初创之功的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霍福兰、卢因均来自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领域,他们凭借着原始的理论基础、跨学科视野以及对传播现象的关注,使得传播学在创立之初便成为一门涉及面极广、包容性极强的学科。但遗憾的是,这四大奠基人在传播学领域绽放光彩之后旋即回到了最初的研究领域。传播学自身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在发展中却很少与其他学科产生联系,同样缺乏直接的方法论贡献。这或许不仅是英尼斯个人思想理论面对的问题,且极有可能是整个传播研究领域所面临的困境,此处仅将英尼斯的传播理论作为个案代表举例。1999年,美国著名新闻传播刊物《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冬季号曾经综合调查众位行业专家意见,评选出35本“20世纪最重要的新闻与传播学著作”^[11],其中就包括英尼斯的《传播的偏向》、罗杰斯的《创新与扩散》等。可见英尼斯传播思想的理论价值已经从最初人们谈到麦克卢汉时附带提及,上升为世人公认的最重要的传播思想理论之一。但有学者通过美国社会科学文献检索系统(JSTOR)检索发现:“除了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被社会学、营销学和农业推广学之类学科广泛引用之外,其他的传播学著作被传播学之外的学科引用的量并不大,有些著作甚至从未被引用过。”^[12]

因此,通过对英尼斯传播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如何突破既有文献积累与研究框架,是否能在英尼斯相关研究中进一步探索更加具有现实价值与意义的锐利方向,乃至提供跨领域方法论的创新与贡献,都是在未来的研究中保持英尼斯传播思想鲜活力与生命力所将面临的严峻问题。

参考文献:

- [1] The 20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Retrieved August 18, 2018, from <http://www.media-ecology.org/annual-convention/>.
- [2] 朱迪斯·拉扎尔. 传播科学往何处去? [J]. 徐达山译.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1989(3).
- [3] 哈罗德·英尼斯. 传播的偏向 [M]. 何道宽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3: 25.
- [4] 徐佳权. 传播图景中的制度——由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谈起 [J]. 国际新闻界, 2004(3).
- [5] 张广生. 媒介与文明: 伊尼斯传播理论的政治视野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7(3).
- [6] 李明伟. 作为一个研究范式的媒介环境学派 [J]. 国际新闻界, 2008(1).
- [7] 哈罗德·英尼斯. 变化中的时间观念 [M]. 何道宽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3: 27.
- [8] 汤文辉. 出版自由与传播垄断——论哈罗德·英尼斯对媒介帝国主义的批判 [J]. 现代出版, 2013(6).
- [9] [美] 林文刚. 媒介环境学: 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 [M]. 何道宽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编者序.
- [10] Neil Postman (1992).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11] P. M. Poindexter & J. Folkerts (1999). Significant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ook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6(4): 627-630.
- [12] 吴飞. 传播学研究自主性的反思 [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2).

[责任编辑: 赵晓兰]